

緬懷歷史，展望未來：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

金國平*

一

整整600年前，也就是1405年，一支由數百艘遠洋巨艦及幾萬名士兵組成的巨大中國皇家船隊，在鄭和率領下，駛向東南亞和東非海面。這是一次世界歷史上神秘而驚人的航行。在中國歷史上，令人難忘，它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鄭和1371年出生於雲南省昆陽的一個穆斯林家庭¹。他的家族來自中亞，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宋朝(969-1279)。他原名馬和。12歲時，在一次戰爭中被俘，後來成為太監。被帶到明朝當時的首都南京後，追隨了當時的燕王朱棣(1360-1424)，就是後來的永樂皇帝(1403-1424)，參加了幾次軍事戰役，尤其是靖難之役。後成為了永樂的親信。1404年賜姓鄭，所以，開始叫鄭和。鄭是中國一個非常普通的姓氏，和的意思就是和諧。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以監軍太監的身份，率領船隊七下西洋，訪問了亞非數十個國家。在28年辛苦的海上生活之後，鄭和可能於1433年死於古里²。

* 中葡關係史及和澳門歷史研究者

1. 鄂法蘭 (Françoise Aubin) 〈鄭和——回族或中國穆斯林的英雄 (Zheng He, héros ethnique des Hui ou musulmans chinois)〉，蘇爾夢 (Claudine Salmon) 及普塔克 (Roderich Ptak) 《鄭和：形象與理解 (Zheng He: Images & Perceptions, Bilder & Wahrnehmungen)》，Harrassowitz Verlag，威斯巴登 (Wiesbaden) 出版社，2005年，第57-73頁。
2. 確切死因史無記載。可能死於與古里王的衝突，關於這個問題，請見金國平、吳志良〈500年前鄭和研究一瞥——兼論葡萄牙史書對下西洋中止原因的分析〉，《澳門研究》，2005年2月，第26期，第144-148頁。

二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海外貿易傳統的國家。³

本文中，我們來簡單地回顧一下元朝(1279-1368)和明朝(1368-1644)的海外貿易。成立了元朝的蒙古人，除了橫掃歐亞大陸的陸地征服之外，也努力發展海外貿易。當時的海外貿易有三種形式：使臣貿易，這是一種通過派遣使節而進行的外交貿易；斡脫貿易(蒙古語Ortoq的譯音。義為官商)；還有官本船貿易。

在元朝，宮廷經常派遣使節，前往海外購買皇室所需要的奇珍異物。當然，鄭和的船隊也繼承了這種為皇室採買的作用。

斡脫貿易是由社會上層人士所進行的，條件是必須按法遵守國家的稅務。

官本船貿易是由市舶司組織的，由官方提供船隻和資本，然後選擇商人進行海外貿易。所獲利潤70%屬於官方，其餘歸屬具體從事者。同時，還提倡官本船貿易。此種貿易最早始於1296年。後於1296年及1314年又重申了禁止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儘管如此，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豪門，對此禁令置若罔聞，普通商人仍然繼續違法出海。這種情況已經超出了朝廷控制的範圍。1323年，元朝被迫撤銷了私人海外貿易禁令，而且取消了官本船貿易。官方壟斷海外貿易的企圖由此而失敗。

我們應該承認的是，向國外派遣使團召來貢使不是暴利行為，儘管是一種不平等的外交活動。

根據這一慣例，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便不失時機地派遣了外交使團到國外。一是宣佈他的登基，二是召來朝貢使團。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勸說貢國不要給被推翻的元朝的殘餘勢力支持。在這一朝，30多個國家向中國派遣了朝貢使團。洪武末年，朱元璋下令將中國周邊15個國家定為不征之國。這意味著放棄了元朝的黜

3. 張天澤(Tien-Tsê Chang)《O comércio sino-português entre 1514 e 1644: uma síntese de fontes portuguesas e chinesas》，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7年，第1-37頁。

武主義。元朝的黜武主義，在征伐日本和爪哇時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因此，鄭和的遠航無領土征服和侵略的企圖。這是在外交與和平貿易範圍之內的使團。然而，如果需要動武消滅海盜、保持秩序，那麼也是會毫不猶豫地動武的。

洪武朝初期所採取的積極、正面的海外政策，從其中期開始，便出現了巨大的倒退。從1383年起，設立了勘合⁴制度，用來嚴格控制和限制朝貢使團事務。同時海禁政策亦趨嚴厲。

正是在此期間，由於日本海盜的騷擾，以及1384年所發生的一次嚴重的中日外交事件，中國同日本斷絕了外交關係。這種外交關係直至短暫的建文年間(1399-1403)才得到了恢復。除此以外，還有一些中國的使節在爪哇和三佛齊被殺。另一方面，三佛齊海面的海盜活動嚴重地影響了外國商人來華貿易的渠道。鑒於此，在1394年終止了一切朝貢使團，只保留琉球、占城、暹羅的使團。在洪武末年，已經出現了一種朝貢使團缺乏的局面，鑒此，海外奇珍異貨也越發缺乏。這種情況只有在鄭和下西洋期間得到了改變。

為甚麼如此壯大的海上航行，突然開始，又突然結束了呢？這一偉大舉動的開始令許多人敬佩萬分，但是它的放棄又使許多中國人感到十分惋惜。在敬佩與惋惜之中，這一歷史事件變成了一種神話。而且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更加神話化了，所以對整個事件還有很多的疑問，尤其是它為何中止。看來似乎沒有甚麼明顯的原因。

官方檔案史料的銷毀使得關於鄭和下西洋開始和終止原因的探討變得更加神秘莫測，籠罩在一片歷史和史學的疑團之中。

派遣鄭和下西洋的人是明朝的第三個皇帝永樂。他登基時，中國的國家經濟已經得到了鞏固。經濟曾受到歷時三年的靖難之役和20萬人攻打越南戰爭的損害，再加上從南京遷都北京也有破費，因此，他

4. 羅瑪麗 (Mariagrazia Russo)、金國平《葡萄牙唐若望五世國王遣雍正帝使團 (Embaixada de D. João V de Portugal ao Imperador da China, Yongzheng (1725-1728))》，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5年，第314-315頁。

放棄了其父的海禁政策，而大膽地開放。這種開放的表現形式便是鄭和下西洋。這是一種新的政策的起始和重要內容。

我們知道，在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是一種國家行為，其中包括了政治、外交、軍事及經濟原因。

初看起來，鄭和下西洋好像是中國外交範圍內的行動，目的是將永樂皇帝登基的消息傳播給中國的朝貢國，但是實際上，除了這一外交層面外，還有一種更迫切的國內需要，也就是說，要中國人承認永樂皇帝登基的合法性，因為他是篡奪其侄子建文的皇位(1377-?)而登基的。各國來朝貢的使團表明了一種準確無誤的政治承認，如同葡萄牙歷史學家巴羅斯所分析的那樣：“這些被征服的王國，作為對中國的承認，從那時起直至現在，每隔3年，遣使中國，進呈禮物。”⁵

尋找建文帝的理論看來似是而非。我們現在來看一些可以排除這種可能的細節。為了準備像鄭和船隊這樣龐大的艦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至少需要幾年。鄭和的第一次航行始於1404年5月。這也就是意味著說，要使船隊在這個日期起航，那麼這項計劃至少在兩年或三年前便開始制定了。這便排除了尋找逃亡的建文帝的理論的可信性。或許是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一種假設：當時鄭和船隊，在建文皇帝統治期間便已開始預備了。篡奪皇位的叔叔利用了侄子已經開始的工作。在鄭和下西洋的頭幾次航行中，可能有這個尋找建文帝的秘密使命，但是，鄭和下西洋持續了將近三十年。這便不能說明一直有這種秘密使命了，而且這種航行一直到遙遠的東非海岸。

至於經濟情況，永樂在登基的初年，便下令重設三個市舶司，而且為番貨規定了關稅。隨貢使團來的貨物需要付6%的關稅，不是隨貢使團來的要付雙倍，也就是說需要付12%。這極高的稅率對於商人來講，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但它表明了中國傳統的、嚴格的朝貢貿易打開了一個缺口，意味著海禁政策的取消。儘管如此，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並非鄭和下西洋成功的唯一因素，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中國當時擁有的先進航海和科學技術，從唐朝(618-907)以來積累

5.《巴羅斯亞洲旬年史之三》，里斯本，1563年，第46頁。

下來的近、遠洋航海經驗等都是要加以考慮的因素。鄭和的船隊沒有發現的使命。儘管未發現新航線，但鄭和船隊的功績在於將已知的航線聯絡了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海上交通網絡，將中國和東非之間廣闊的海域變成了“中國的地中海”。⁶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的迅速恢復造成了新的政治及經濟格局的出現。這為鄭和的遠航創造了有利條件。越來越多的絲綢、瓷器和茶葉需要新的外貿市場，因此，鄭和的遠航也是中國貨物向東南亞和印度洋市場銷售的官方渠道。無論是通過皇帝的贈禮，普通的送禮，還是一切按照中國傳統政治化的直接貿易，而且從深層而言，所謂貢國帶來的貢品，實際上是一種官方商業交易，但是對於中國有著十分巧妙的心理、政治及外交作用。鄭和下西洋的頻率之高正說明永樂帝多麼渴望從鄭和船隊的航行中得到經濟活動的利益。除了取消海禁政策外，永樂皇帝還以很大的政治智慧建立了國家壟斷貿易，來打擊私商的利益。永樂皇帝利用國家的資源組織了由鄭和帶隊的七下西洋，目的是彌補貢使團不來所造成的缺乏，將所有的外貿活動控制在國家手中，而且把這個重擔交給一個他信賴的人。這一切措施都起源於元朝，對此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所分析。

如果說鄭和遠洋有經濟目的話，如前面分析過的那樣，這些經濟目的不是持久的，也不是像歐洲海外擴張那樣長久的。

除了這個原因外，中國船隊的軍事力量，對於周邊國家來講，是一種威懾力量，尤其是對於那些企圖入侵中華帝國的周邊國家而言。我們這一論斷的論據在於，為了完成已經計劃的經濟、政治及外交任務，不需要如此龐大的武裝力量。裝備精良的鄭和船隊，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可以具有攻守兩種性能。一是保護本身船隊船員的安全，二是保護所運載的昂貴貨物。所運載的貴重物品說明，鄭和下西洋具有經濟性質。但是，威懾作用是主要的。監視船上將近三萬名船

6. 孟席斯（Gavin Menzies）描寫的中國船隊環球行航線只存在於他的腦海中，毫無根據。漢語圖文史料說明鄭和船隊未超越莫桑比克和索法拉。具體考證見金國平、吳志良〈鄭和航海的終極點——比刺及孫刺考〉，王天有、萬明編《鄭和研究百年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60-273頁。

員是鄭和及其它太監的主要任務。這說明篡奪其侄子皇位的永樂帝無法信任其他官員，只能信任他周圍的宦官。這些是他信得過的人。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宦官第一次開始直接握有軍權。這將成為後來罷下西洋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文武官員對太監有嫉妒，藉口遵守以前的規定來以避免太監干涉朝政。

一方面來說，鄭和的遠航，在中國的外交及防務中具有巨大戰略重要性。蒙古人是優秀的騎兵，他們橫掃了中亞、東歐、以及中東，開創了“蒙古和平”時期，大大方便了通過北部草原所進行的陸地國際貿易，但是他們在征伐日本、安南和爪哇的海上軍事行動中，卻大受挫折。為了有效地對付北部草原的蒙古人（當時他們對於明朝的國家防衛來說，是一個經常不斷的威脅），永樂皇帝將帝國的首都南京遷往了他以前的封地北京。以北京為基地，他篡奪了其侄的王位。明朝定都北京後，在北部邊疆集結了大量軍隊，對蒙古族五次用兵，目的是為了阻止他們再次侵入明朝的地界。在南方，同時也攻打了安南。在這種情況下，鄭和的遠航具有平定亞洲海上各國的目的。同時，向蒙古人示威中國的軍事力量。以此來向他們傳達一個非常微妙的資訊：如果我們有能力進行海上遠征的話，那麼更有能力，更加容易進行陸地征伐。對於安南人來說，鄭和的遠航，也是一種威懾力量。這一切的目的是為了避免以後有可能征戰或者是佔領而帶來的巨大軍費開支。

總而言之，明朝的軍事的重點是北邊的防務，防止被趕下臺的蒙古人捲土而來。他們需要在中國的南部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們不能夠同時在兩個方面開戰。也許這是中國海上擴張的主要戰略目的。

許久以前，人們便提出了這樣的設想：如果中國人繞過了好望角，那麼對於全世界的海外發現來講，航海能力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航海的原因、地圓說，以及航海技術。

在大航海時代，在東方，像中國和穆斯林世界這樣的封建社會，已經達到了它們的發展頂端。這也同時意味著，開始走向衰落。在西方，一個文藝復興後的歐洲，正在沖出中世紀的黑暗。通過伊比利亞的三桅帆船，創造一個新的貿易時代。這些帆船帶著強烈的經濟及宗

教動力，進入了以前由中國帆船航行的水域。當達伽瑪的船隊進入印度洋時，鄭和的下西洋已經成為了歷史的回憶。達伽瑪的船隊儘管在船數上和人數上遠遠小於鄭和的船隊，但它是一種具有活力的基督教文化的先驅，因而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鄭和的船儘管數量多，而且是當時最先進的船隊，可它已經在上演中國千年海外擴張的最後一幕。

儘管永樂朝具有擴張的性質，將中國的領土一直擴張到了克魯倫河和黑龍江，但是沒有從海陸進行領土擴張的需要，因為中國皇帝自認為是天下一切已知或未知東西的主人。對蒙古人和越南人的討伐，是為了保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因此，鄭和遠航也有同樣的目的。這實際上反映了一個傳統的中國人的戰略思想——遠交近攻。在第一種情況下，為了節省用於長途征戰可能帶來的巨大軍費開支。在第二種情況下，是為了消除最緊迫的危險。

由於中國從來沒有過國家宗教，因此，沒有傳播信仰的明確任務。這與達伽瑪的船隊是十分不同的。

一系列深刻而複雜的原因造成了這種形勢。我們認為，鄭和下西洋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明初，在中國傳統的農業封建社會內部，還沒有重商主義的萌芽，也沒有外部市場的很大需要。於是，鄭和的遠航沒有明確而持久的原因和目的，但是永樂朝是一個特殊的情況，一切取決於皇帝個人的意志。因此，許多政治、外交、軍事性質的使團，隨著皇帝的改變而一個一個被中止了。要將鄭和下西洋開始及中止的特點和原因，按其重要性做一排列的話，即便說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難的，因為在不同的時期，重要性的位置有所不同，根據情況而有所改變。鄭和曾為三個皇帝服務，他的航海事業，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是屬於全國性和皇帝的，即便如此，未得到應有的繼續。葡萄牙歷史學家巴羅斯，在16世紀便企圖對鄭和下西洋中止的可能原因做了一些分析。他說：

“但當他們從陸地或水路前來印度時，（前有所述），其行動必比希臘人、羅馬人、迦太基人尤為小心謹慎。華人因征戰他國，遠離故土，竟然一度失去了自己的祖國，但無意

重蹈覆轍。相反，看到他們在印度勞民傷財，與四鄰兵戎相見且時有敗北時，他們發覺自己的土地上有金有銀，其他金屬不一而足，自然財富如此豐富、百工技藝如此高超。人人從中國得益，但她從未從他人處獲益，為何他們要流血征服他人之地？在當時一位賢明君主的命令下，華人重返家園，實行務實的防務，但詔令不得出海，違者以死論之。”⁷

中國史料也把人員的損失、經濟的損耗作為鄭和下西洋中止的兩個原因。這位葡萄牙歷史家說的很准。自然，這位葡萄牙編年史家，受到當時時代思想的局限，把中國人下西洋認為是“流血征服他人之地”，但鄭和下西洋的意圖更加微妙，而不是簡簡單單的領土征服與佔領。

如果我們做一個綜合的分析，鄭和下西洋是國家海外貿易、中國皇帝環視世界之雄心及軍事威懾行動的巧妙結合。

近600年以來，鄭和下西洋無緣無故地被人們遺忘了，因此，鄭和下西洋變成了一種神話。在皇帝的命令下，鄭和下西洋被禁止了，曾經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船隻，毀爛於中國南方的港口中。甚至連皇帝的造船廠都已經失去了寶船的尺寸。

隨著鄭和的逝世，下西洋也壽終正寢。然而，在伊比利亞國家的海外發現中，出現了無數的哥倫布，無數的麥哲倫，可中國的歷史上卻再也沒有出現過第二個鄭和。這難道不是很說明問題嗎？

在民間，鄭和下西洋已經成為了一種神話傳說，但正史卻沒有給他應有的地位。鄭和被人們所遺忘，不是一種偶然的疏忽與巧合。它是對歷史價值主觀評估的一種表現形式。鄭和這個偉大人物的形象，儘管在中國受到了遺忘，但是在東南亞的中國人社團中，他一直受到紀念，已經將他神化。他們把鄭和尊為保護神。⁸

7.《巴羅斯亞洲旬年史之三》，第46頁反面。

8. Claudine Salmon〈三寶太監在印尼及“西洋記”的馬來語譯本（*Sanbao taijian en Indonésie et les traductions malaises du Xiyangji*）〉，《鄭和：形象與理解（*Zheng He: Images & Perceptions, Bilder & Wahrnehmungen*）》，第113-118頁

三

長125米、寬50米的神話般的“寶船”是由李約瑟、李露曄和孟席思⁹在西方傳播開來的。我們看到的是，一艘小小的歐洲三桅帆船在前，後面背襯的是一艘巨大的中國式帆船。這張圖片¹⁰傳遍了世界。根據某些中國史料，鄭和寶船的尺寸是“長四十四丈四尺，闊十八丈”。這裏基本的尺寸是尺。明代花雕明尺是0.283米，因此44丈4尺長，18丈寬相當於125.65米和50.94米。如果用相當於現在的0.32米的營造尺(就是所謂的建築用尺)來丈量的話，那麼是142.08米和57.6米。

這些尺寸的可靠性，受到了現代中國和世界造船業的質疑。¹¹中國現在的造船業至今沒有能力可以造出不用金屬結構的這樣大的一艘木質仿古船。這樣，中國學術界也對這些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質疑。根據最新的研究，這樣大的寶船，如果曾經存在過的話，可能是用於儀式的大駁船，只能夠在江河內航行。皇帝在這種船上送別將遠航的船隊。這種船決不能作為遠洋船隊的旗艦。

根據一塊有關鄭和船隊的石碑記載，最大海船是2000料。¹²一艘2000料的船相當於61.2米長，13.8米寬。

最近，在以前為鄭和船隊造船的6個船塢中進行了考古發掘。這些船塢長500米、寬40米、深6米。根據這些資料，以及另外兩個出土的

-
9. 孟席斯《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倫敦，Bantam Press，2002年。這是一本徹頭徹尾的偽書。值得一提的是，Dan Brown的《達芬奇代碼》與此書出自同一書商。最近，負責梵蒂岡宗教理論事務的Tarcisio Bertone紅衣主教稱《達芬奇代碼》為“一口袋的謊言”。這也適用《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參見金國平、吳志良〈“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過十字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第322-368頁。葡語評論文章，可見席爾瓦醫生(Dr. Manuel Luciano da Silva)的網站：<http://www.dightonrock.com/commentsandbuttalsconcerning142.htm>。
10. 李露曄(Louise Levathes)，《當中國稱霸海上時(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紐約，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1994年，第21頁。
11. 關於這個問題較全面的論述可見Sally K. Church〈鄭和巨船：圖像或現實？(The Colossal Ships of Zheng He: Image or Reality?)〉《鄭和：形象與理解(Zheng He: Images & Perceptions, Bilder & Wahrnehmungen)》，第155-176頁。
12. 一種中國古代的造船容積單位。

11丈左右的舵(一個是1957年出土的，一個是2003年出土的)，蘇明揚先生現在提出了這樣的尺寸：長70米，寬14米，船深7米，吃水5.3米。舵高11米。

考慮到前面說過的2000料船的碑文，這些尺寸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在卡特蘭地圖中描繪的中國式帆船的長度是60瓦拉，相當於51.154米。

無論如何，兩個足球場這樣大的鄭和寶船是不可能具有可航性的。可能只是一種神話傳說，而且是由明史保存下來的一種傳說。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明史是在18世紀中葉才成書的。

四

如同歐洲的海外發現那樣，鄭和下西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傳播作用。中國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鄭和的船隊將中國的文化傳播到了南洋。同時，也將其他文化帶到了中國。這樣，形成了一種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和的高潮，成果累累。

鄭和船隊在30年中，構成了一個貫通亞非的海上貿易網絡。這在中國古代世界地理上，豎起了一個歷史豐碑，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將中國人的視野投向了東非。

虧得這條穩定的航線，尤其是通過瓷器和絲綢，構成一個巨大的商業網，它將中國文化隨鄭和船隊航行而傳播到所至各地。

除了傳統的沿岸航行之外，中國船隊還使用了指南針和天文航行來穿越波斯灣。

在15世紀初，相當多的亞非國家與中國相比，仍然處於一個不太發達的階段。他們的社會文化發展遠遜於中國。根據隨同鄭和數次到過錫蘭國的隨行人員龔珍的記錄：“此處人皆巢居穴處，男女亦體如禽獸然，無寸衣著膚。”¹³。溜山國“其人皆巢居穴處，不著衣衫，只以樹

13. 龔珍《西洋番國誌》，向達整理，中華書局，1982年，第32頁。

葉遮蔽前後。平生不食米穀，惟於海中捕魚蝦而食之。”¹⁴除此以外，許多國家，如爪哇、南巫里和淳淋邦這些同中國關係密切的國家使用中國製錢為貨幣，而在暹羅、孟加拉還使用貝幣。中國銅錢的傳入，大大方便了貿易交流。我們並不是說，中國金屬錢幣是由鄭和傳入到這些地區的。的確，鄭和的船隊加強了中國貨幣在這些地區更廣泛的大量流通。

至於日曆，這些國家同中國相比，也相當落後。例如在占城，“不解朔望，但以月生為初，月晦為盡，不置閏。分晝夜為十更，……”¹⁵在帝汶“不知年歲”¹⁶。葡萄牙史學家巴羅斯有這樣的評論：

“不僅上述王國，正如前述，暹羅中包括的大小諸國，如位於勃固北部的梅里台(Melitay)、堡高(Bacam)、茶蘭瓦拉固(Chalam Varagu)及其他與其相臨的內陸王國，或多或少地保存華人的宗教、華人的自然科技知識：他們將年分為12個陰曆月份，在黃道圖中使用12宮及天體運動的其他知識。因為華人在其征討之地，傳播了他們的文化。”¹⁷

在日常生活當中，中國常見的普通生活用品，例如床、板櫬、筷子、勺子、盤子、杯子等等，在鄭和船隊訪問過的國家和地區，之前也是不會使用的。中華文明在這些地方的輸入，加速了當地的社會發展。這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及世界歷史的巨大貢獻。

中國人的海上擴張，具有文化傳播的作用，同時還具有商業作用。它的影響未隨著鄭和船隊的停止而消失，一直保存至今。

五

很早以來，中國15世紀的海外航行，便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興趣。葡萄牙人一到達東方，便出於戰略的目的，搜集了關於中國人海上航

14. 同上，第22頁。

15.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392頁。

16. 張燮《東西洋考》，中國史學叢書35，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第151-152頁。

17. 《巴羅斯亞洲旬年史之三》，第46頁。

行的資料。在葡萄牙作家巴羅斯、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 (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加爾西亞·達·奧爾塔 (Garcia da Orta) 及杜瓦爾特·巴爾伯薩 (Duarte Barbosa) 等著作中，有許多關於中國船隊的情況¹⁸。這些是歐洲最早的關於15世紀初中國海上擴張的資訊和研究資料。最早的西方研究論文，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這便是1874年和1875年間，由英國駐華外交官梅輝立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在《中國評論》雜誌上發表的〈十五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 (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一文。這篇文章被認為是當代西方最早的鄭和研究論文。迄今為止，鄭和研究的國際書目¹⁹，已經相當可觀，但是，最新一本，也是第一本有關鄭和的專著是蘇爾夢 (Claudine Salmon) 和普塔克 (Roderich Ptak) 主編的《鄭和：形象與理解 (Zheng He: Images & Perceptions, Bilder & Wahrnehmungen)》。

六

鄭和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個悲劇。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的悲劇。他的業績是這樣輝煌，但是後來卻被人們所遺忘了。這種無知將他神化了，將鄭和下西洋變成了一種神話。直到20世紀初，中國人才再次發現了鄭和。²⁰當時，中國正在深重的衰落之中，已經沒有任何希望恢復。同西方文明相比，已經十分落後。鴉片戰爭給中國人留下的創傷和屈辱仍然十分深刻。緬懷過去的光榮，這種光榮的體現正是鄭和下西洋，中國人開始試圖回答這樣的

18. 金國平、吳志良〈葡萄牙史料中所見鄭和下西洋之史實述略〉，《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212-246頁及阿爾維斯 (Jorge M. dos Santos Alves) 〈預言之聲：關於鄭和航海的16世紀前半葉的葡萄牙史料 (La voix de la prophétie: Informations portugaises de la 1^{re} moitié du XVI^e sur les voyages de Zheng He)〉，《鄭和：形象與理解 (Zheng He: Images & Perceptions, Bilder & Wahrnehmungen)》，第39-55頁。

19. 金國平《鄭和下西洋與“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2004年12月7日於葡萄牙海軍科學院演講稿（印刷中）。

20. 關於鄭和研究的優秀述評，可見蘇爾夢和普塔克《鄭和：形象與理解 (Zheng He: Images & Perceptions, Bilder & Wahrnehmungen)》，第9-35頁。

問題：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有過如此之多的發明，改變了世界的進程，為甚麼具有悠久歷史的中華文明讓位於西方文明？這便是十分有名的李約瑟命題。為甚麼中國企圖以孔孟之道德化世界，但是沒有使世界中國化，但是卻被西方西方化了？為甚麼世界海外地理大發現的重擔落在了伊比利亞人的肩上？

同伊比利亞海外發現的偉大時刻相比，鄭和下西洋給中國人留下了一些遺產，這是驕傲和悔恨。驕傲的是過去的光榮，悔恨的是這種驕傲曇花一現，不再出現。中華民族在這種矛盾中將近生活了一個世紀。中國人在仔細、認真、客觀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從來沒有能夠尋找到回答這些問題的答案。

驕傲總是曇花一現的，而且明顯地帶有一種潛藏的痛苦。悔恨卻是不斷的，永遠折磨著中華民族。中國永遠不會忘記輝煌的15世紀。這個世紀之初以中國為世界大舞臺，但是結果卻讓位與伊比利亞人。在這一個世紀中，一切都改變了。15世紀初，中國的船隊航行於印度洋，但是在15世紀末，卻看到了新世界的發現和印度海道的開通。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巨大的中國退出了世界舞臺，讓位於葡萄牙這樣一個小國。而卻卻是這樣一個小國，開闢了一個巨大的海上帝國，一個多元文化的、多種族的洲際海上帝國。

鄭和的遠航在中國，以及世界航海史上，是一史無前例的偉大壯舉。但也必須承認，鄭和的遠航不是發現，也不是探險。²¹當明朝中止了海上擴張時，葡萄牙這樣一個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小國，開始了她世界性的發現。這些發現，完全改變了世界的走向及人類的命運。葡萄牙的海外擴張開始了全球化，創造了一種新的秩序，這種新的秩序便是以堅船利炮為基礎的。他們在印度洋、東南亞橫行一時。然後出現的是西班牙帝國、大英帝國和山姆大叔帝國。這是從羅馬帝國消失以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

鄭和下西洋未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但它卻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便是15世紀。

21. 張箭〈鄭和下西洋與西葡大航海的比較〉，《中西文化研究》，澳門理工學院，2004年12月，第2期，25-34頁。

不是葡萄牙戰勝了中國，而是中國文化在孤芳自賞的中華帝國中心主義中迷失了，讓位於文藝復興後的歐洲文化。

鄭和下西洋的停駛，給中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由於中國自動退出了世界舞臺，閉關鎖國，中國整整用了600周年，才作為全權成員再次重返國際社會。也許這是我們應該從鄭和在那個遙遠的1405年首航中應該得出的最大借鑒。

在歡樂的時刻，中國人情不自禁地會想到鄭和的下西洋。這是令中國人激動、振奮的事情。但是在逆境中，中國人也會想到鄭和那淒慘的命運。鄭和下西洋既是一種光榮，又是一種惡夢。它在不知道多少年中，困擾著中國人。正是帶著這種複雜而矛盾的心情，中國人在慶祝鄭和首下西洋600周年。如今，對於中國人來講，鄭和下西洋不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歷史事件，而且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種象徵，成為了一種開放的借鑒。為中國(書面)歷史所遺忘的鄭和下西洋正在被現代中國所再次紀念。現代中國已經十分意識到閉關鎖國的巨大危害。如同西班牙人在1992年大肆慶祝哥倫布、葡萄牙人在1998年慶祝達伽瑪，中國人在非常隆重地慶祝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從這些活動中，可以看到某些民族主義，是一種積極的、令人向上的民族主義。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沉睡了六個世紀以後，再次重返世界舞臺，這說明了一個古老的民族獲得了新生。

在鄭和下西洋中，凝聚了多少中國人往昔的夢想，寄託了中國人所有的集體記憶，使他們想起了15世紀初那個強大的帝國。同時，也為中國的未來找到一個歷史借鑒。

願中國緬懷紀念鄭和下西洋，面對21世紀的挑戰，更加全面開放。只有這樣，600年來鄭和的悲劇、中國的悲劇才不會重演。